

保卫历史学

To Defend Historiography

李 勇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保卫历史学

李 勇 著



世界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保卫历史学 / 李勇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012-3618-3

I. 保… II. 李… III. 史学—研究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4903 号

责任编辑 杨志芬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张 琨
封面设计 小 月

书 名 保卫历史学

Baowei Lishixue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联照排公司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9 印张
字 数 196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0 月第一版 200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618-3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认识篇

第一章	“体统各殊，旨归咸别”：历史学的界定	3
第二章	荒唐而危险的“紧箍咒”：科学性的滥用	25
第三章	有区别的反思：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分野	52
第四章	释去期望重负：拒绝社会对历史学的过分要求 ...	73
第五章	“危机”与“困惑”背后：价值体系的分裂	88
第六章	实用中史学主体的两难：历史学实用化悖论 ——以吴晗为例	100

方法篇

第七章	“其名万殊，其义一揆”：怀疑态度与史料演进 ...	115
第八章	逻辑起点与方向标：历史观的作用不容忽视	135
第九章	历史主义：作为方法的价值与局限	157
第十章	阶级意识：仍然具有社会基础	170
第十一章	从比较到交流：中西史学结合研究新走向	185
第十二章	他山之石有锐钝：引进西方史学的尴尬	210
附录一	中国学者西方史学研究个案评论	223
附录二	参考文献	254

认识篇

第一章

“体统各殊，旨归咸别”： 历史学的界定

如果把孔子删定《春秋》、希罗多德写成《历史》，分别作为中西史学产生的标志，那么历史学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了。然而，“什么是历史学”，斯为专业学者必须首先给予明确回答的问题。饶有意味的是，这一问题的答案至今仍见仁见智，正应了刘知幾的话“体统各殊，旨归咸别”。^① 历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自然与国家政治、社会权力无法分离。不过，让我们暂时撇开这些因素，而只着眼于其学术特征，这样，就可以把历史学当成知识体系中一种学问或学科来看待，从而界定其概念了。而且，作为一位中国史学从业者，在界定这一概念时，应该具备中国人的视野。此外，在得出结论之前，对以往学者不同观点进行回顾和分析，确是非常必要的。

^①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忤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五九一页。

一、中国古代学者的看法

中国“史学”一词，依据现存材料，较早出现在晋、南北朝时期。东晋大兴二年（319），石勒称赵王，以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建儒、玄、文、史四学，以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收授门徒。

早在“史学”一词出现之前，古代许多学者就开始自觉反思过历史学，本质上回答过什么是历史学这一问题。之后，他们的思考更为系统了，以至于产生像《史通》、《文史通义》这样专门著作。

概言之，中国古代学者提出、思考或者阐述的问题有：历史学源流、动机、目的、功能、原则、方法和怀疑态度，史学中古与今、史与论、主观与客观等，可谓丰富多彩。其范围所及，差不多达到20世纪学者所涉领域，或者说20世纪史学家所思考的历史学概念问题，除历史学科学性问题的外，古代学者几乎都思考过。这些问题都可以作为专门课题进行探讨。这里不过举一些案例加以说明而已。

关于史学源流。《汉书·艺文志》中说：“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①这句话就是班固对记言、记事类史书起源的精辟概括。《隋书·经籍志》则把《春秋》类，即编年类名为“古史”，所谓“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②后来刘知

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七一五页。

② 魏征等：《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7年，第九五六页。

幾在《史通》中，把它视为六家之中排序第二的《春秋》家^①。到了清人编《四库全书》，把历史著作分为：“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抄，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② 这些对史书的条理分类，也就是所谓辨彰学术、考镜源流，其实就是对史学起源问题的检讨。

关于史学动机和目的。司马迁自述其作《史记》动机是：太史令司马谈因为汉武帝“封禅”没有让自己随从，于是有一种失落感，认为自己不会受到重用了，但是在转而立言却又无力完成情况下，只好把事业托付给儿子司马迁。司马迁受父亲之嘱托并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加之他恰遭李陵之祸，身废之后，思鉴前贤之业，于是发愤以作《史记》。其作《史记》目的是，记载明主盛德，功臣、士大夫伟业，继承先人之言，即所谓“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同时，表明自己志向“述往事，思来者”，“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③。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说史学目的是“彰善瘅恶，树之风声”^④，“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兴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

①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页。

② 永瑤：《四库全书总目》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三九七页。

③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第七一，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三二九五—三三二〇页。

④ 刘勰著，詹鍈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史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五六二页。

地而久大”^①。

关于史学功能。刘勰曾经指出：“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羸是非之尤。”^② 言语不多，但是把史学重要性概括出来了。刘知幾说：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篋，而神交万古，不出庭户，而穷览千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③

这段话肯定了历史写作对于保留历史内容的意义。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从大处而言，“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④ 具体说来，“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⑤ 司马光以为，人主如果能够读好《资治通鉴》，就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之群生，咸蒙其福”^⑥。其话虽是就《资治通鉴》而说的，但也表明他从一般意义上对于史学功能的充分肯定。

① 刘勰著，詹鍈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史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六〇二页。

② 刘勰著，詹鍈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史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六一八页。

③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史官建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三〇三页。

④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史官建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三〇三一—三〇四页。

⑤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曲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九九页。

⑥ 司马光：《进书表》，《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九六〇七页。

关于写作原则与方法。刘知幾在《史通》内篇中详述了自己关于选材原则和撰写方法的观点。他谈到选择所叙述事件的标准是“五志”、“三科”。所谓“五志”，就是“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而所谓“三科”则是“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①。至于方法，刘知幾有更为系统的论述。关于叙事，他指出，“史之为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②。还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③可见，“文而不丽”，“质而非野”，“简而且详”，“疏而不漏”，是他对叙事的基本要求。关于记载人物乡里，他认为：“先述本居。至于国有池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④这一主张可以使人物乡里记载翔实而有条理。关于载言，他说：“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仿此。”^⑤他为了避免历史叙述繁芜而提出如此设想，这正是后来章学诚称之为“文征”的。关于增删，他以为，“论史之烦省

①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书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二二九页。

②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六五页。

③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书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二三三页。

④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邑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四三页。

⑤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三四页。

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阙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其斯之谓也”。^①也就是说，是否增删，当不以世事厚薄为准，而视是否妄载或者阙书而定。关于文风，他主张“文尚简要，语恶繁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②可见，他提倡文约事丰的文风。司马光在完成《资治通鉴》后，写了一份《进书表》，其中说到选题原则是，“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③。

关于怀疑态度。刘知幾明确指出：“远古之事，其妄甚矣”^④，“讹言难信，传闻多失。”^⑤还说：

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册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⑥。

①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烦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二六六页。

②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表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五三页。

③ 司马光：《进书表》，《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九六〇八页。

④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疑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三九四页。

⑤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一七页。

⑥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一五——一六页。

他批评鲁《春秋》“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①。这些材料说明，他充分意识到史书中包含着“妄”、“讹”、“失”、“邪”、“虚”、“讳”、“诬”成分。刘知幾找出造成不可信的原因是：第一，行者作伪，受者不疑，“行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故使见咎一时，取怨前载。夫史传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难凭，欺诬可见，如古来学者，莫觉其非，盖往往有焉。”^②第二，后人文过饰非，“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③第三，史书文辞所造成，“魏晋以下，则讹谬雷同。椎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④这样写出的著作，就“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⑤因此，他主张史家应具有批判怀疑精神，那就是“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⑥

关于古与今、史与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说到史

①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惑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四〇五页。

②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暗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五七一页。

③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探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二一〇页。

④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二四页。

⑤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二六页。

⑥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一八页。

学是“居今识古”^①，就涉及历史学古与今问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谓“通古今之变”也是很典型的古与今问题。至于史与论，班固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②说的就是，司马迁父子以黄老学说指导历史研究，而班固父子是以六经思想作为史学之灵魂。

关于史学主观与客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要求史学家“文疑则阙，贵信史也”^③，从而提出客观性问题。刘知幾关于史学主客观性问题的论述颇多。其《史通》中《曲笔》和《直书》说的就是史学客观性问题。他论《直书》说：“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④在谈到《曲笔》时，他又说：“史氏有涉君亲，必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⑤他看到史学中的无定识，所谓“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诤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⑥在他看来，之所以“无定识”，主要是主观性在起作用。其做《史通》“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戒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

①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史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五六〇页。

② 班固：《司马迁传》，《汉书》第三十二，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七三七一二七三八页。

③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史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六〇九页。

④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直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九三页。

⑤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曲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九六页。

⑥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鉴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二〇四页。

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①更体现刘知幾个人的主观见解。他所谓“诸史之作，不恒厥体”^②，通常被理解为史学家创新问题，其实创新说到底也是主观问题。另外，《旧唐书·刘知幾传》中收录他的答郑惟中关于“文士多而史才少”的问题，其中阐述了才、学、识史家三长，这更是典型的历史学主观性问题。章学诚论史学主观性问题也比较突出，属于章学诚独创的思想，瞿林东曾经概括为，第一，史学的核心是“比事属辞”、“心知其意”。第二，“史法”与“史意”的异趣。第三，史学贵在“著述成家”、“义有独断”。第四，区分“撰述”和“记注”两大部门^③。此外，要补充的是，章学诚在刘知幾史家三长说基础上增加“史德”说，从而发展为史家四长。可见，章学诚把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对于史学的作用强调出来。四库馆臣还思考过如何从众多带有偏见的观点中寻出中肯的意见，其中说道：

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④

此言论史学主客观性颇为精当。

①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忤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五九一页。

②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一页。

③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11页。

④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三九七页。

二、20 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观点

20 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开始系统反思历史学本质问题，除了像古代学者那样思考史学目的、功能、方法等问题外，他们进一步从认识论上赋予历史学概念以新内涵。其中，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就非常突出。

一般认为，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理论创立者。虽然有学者指出梁启超在不同时期关于史学科学性论述有变化甚至完全相反^①，但是总体说来，他在倡导史学科学化。梁启超说过：

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中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②

其实，早在《新史学》中他就开始了这种努力，其中《史学之界说》在论史学时说：“天下万物，皆在空间，又在时间。而天然界与历史界实分占两者之现象也”，历史学则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③。后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把历史学目的说成“将过去的真

① 详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 年，第 9—60 页。

②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5 册《文集之 40 卷》，中华书局，1989 年，第一页。

③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文集之第九》，中华书局，1989 年，第七——一页。

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①表面上，就像许冠三所说那样，梁启超关于历史学对象、目的和科学性观点有很大变化，后期完全否定了前期。然而，本质上他一直在倡导历史学科学性，具有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倾向。实证主义史学在西方代表史学科学化追求，服膺孔德实证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主张要像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那样去研究历史从而建立科学历史学。科学历史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军事史，而且要研究其以外的历史；不仅要真实叙述历史，而且要赋予历史以解释，发现历史规律。梁启超主张历史学是科学，同时提出历史学“必当和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至穹古之石史，下至昨日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②他强调史料之重要，主张赋予史料以意义，显然是实证主义的做法。

具有与梁启超同样倾向的还有其他人，例如李大钊，也主张历史学是科学。他曾指出：关于史学家职责有两种看法：一是考证每个具体的史实以求其明确而寻求史实间的联系以明确其因果关系；二是不仅在就特殊事例的本身解释史实，更须汇类种种史实，一一类别而为比较，以研究古今东西全部历史的事实，为一般的解释，明普遍的理法。第一说反映史学正处于幼稚阶段，而第二说表明史学“与其他科学根本无异”。即使是第一说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是史学的幼稚，不是史学的特色；只能说史学的发展，尚未达到与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五页。

②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第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一〇页。